

大專用書

意識型態

與現代政治

恩格爾等著 張明貴 譯



意識型態與現代政治

張明貴 譯

大專用書

意識型態與現代政治

原著 Alan Engel etc

譯者 張明貴

校稿 張明貴

發行人 賴阿勝

出版 桂冠圖書有限公司

登記 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六六號

地址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話 三九一、一四〇七 三四一、六九四九

郵撥 一〇四五七九

印刷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三十一日

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

◎本書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評介：「意識型態與現代政治」——代譯序

一

縱觀人類近代史，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各種主義前後相續，紛然雜陳。放眼當代世界社會，自由民主與共產極權依然對立，莫衷一是。顯然，這是一個觀念與觀念相衝突的時代，意識型態在世界的政治舞臺上仍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西哲羅素即曾指出，人類社會之間所以猛烈爭戰，思想信仰的不相容實爲主因之一，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思想信仰的不相容當爲一大導火線。當代許多政治學者亦已充分認識到信仰與行動間的關係，而視意識型態爲解釋政治行爲與現象的主要變數之一。因此，以各種主義或意識型態爲主題而著書立說者，頗不乏人。惟意識型態之研究易涉及主觀價值偏見，且欲以一己之力窮研各種主義，亦非易事，因此有關意識型態之論著雖多，佳作却不屢見。

「意識型態與現代政治」一書，主要卽在於革除一般論述意識型態或各種主義之書的缺失，合數人之心智結晶，爲研究政治與欲瞭解當代政治情況者提供一本比較合適的參考讀物與入門

書。尤其，此書的作者們發言立論，旨在刺激讀者對意識型態與政治問題的慎思、明辨與研討，不在提供讀者一成不變的政治信條與行動準則，更增加了此書的可讀性。事實上，此書在一九七一年初版問世後，即普受重視，而且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短短幾年間，再版發行，足見此書不但言不虛發，尚且能激起迴響，自亦有其特質。

此書針對當代各種主義的來龍去脈、理論與實際、性質演變，乃至利弊得失，皆一一提出客觀平實與配合時勢的剖析。而本書實即結合了歷史背景、事實的描述與理論的分析，從意識型態的研究途徑深入淺出地探討與論述當代的主要政治問題。全書凡二百八十頁，共八章，分成「導論」、「民族主義」、「極權主義」與「民主」等四部分。

就此書的結構而言，極權主義部分包括四章，佔全書之一半。顯然，這是作者們鑒於極權主義實對廿世紀的人類社會構成嚴重的威脅，而其勢力至今似乎有增無已，幾乎籠罩地球一半以上之面積，因此不能不對之做較詳盡的論述，俾使讀者洞悉極權主義的真相。再者，極權主義的部分有兩章專論共產主義，這種安排亦相當得體。全書各章所佔比例亦頗均衡。整體而言，此書之組織結構，可謂勻稱適當。顯然，這主要是作者們針對第一版時編排上的缺失，接受批評與建議，加以改進的結果。在第一版時，此書曾以一章的篇幅，論述在一九五〇與六〇年代一度極為囂張猖狂的新左派與極右派，惟自進入一九七〇年代以來，走極端的意識型態已逐漸銷聲匿跡而

不成氣候，因此，在第二版中已被刪略。

此書的五位作者：克里斯田森、恩格爾、雅各伯、雷嘉與華爾澤在本書出版時，均為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系的專任教授，其中華爾澤尚且擔任該系的系主任。從作者們的行文運筆乃至立言態度，可以看出他們都是愛好自由而態度開明的高級知識份子。他們爲了完成此書，分工合作，各盡所能，且表明文責自負。華爾澤負責開頭結尾，亦即撰寫政治意識型態的「導論」一章與結語，此外尚撰述「政治民主」（第七章）；雷嘉撰寫「東方與西方的民族主義」（第二章）與「游擊共產主義」（第六章）；恩格爾撰寫「極權主義的意識型態」（第三章）以及「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第四章）；雅各伯論述「東方與西方的共產主義」（第五章）；克里斯田森除撰述「經濟民主」（第八章）外，亦爲此書之總編審。雖然這五位作者並非當代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亦非思想界的泰斗，但他們集思廣益，羣策羣力，終致他們的心力沒有白費，甚至超過許多個別作者著書的成就，十分可佩。以下，吾人即就此五位作者在本書中的論述，逐章予以扼要地評介。

二

導論部份實即在簡介政治研究中的意識型態研究途徑，因此僅由論述「政治意識型態」的一章構成。觀此章的副標題爲「政治中的信仰與行動」，顯然華爾澤是將意識型態視爲「與行動相

關連的信仰或觀念體系。」事實上，這也是本書立論的一個基本假定與大前提。華爾澤在此章中，主要提出了三個大問題：政治意識型態是什麼？爲何有意識型態？爲何要研究意識型態？他以自問自答的方式，逐一提出正確與可行的解決問題的途徑，並且鉤玄勒微，語重心長的激發讀者對於意識型態的思考。

首先，他爲意識型態正名，提出一個實用的定義。他指出意識型態一詞，本源於法國哲學家在大革命時期研究觀念所創發的中性字詞。惟經過拿破崙的刻意曲解、馬克思與曼漢（Karl Mannheim）等的主觀成見，與極權主義者的玩弄利用，遂致意識型態變成一惡名，甚至被視爲「經驗上爲假而道德上爲錯的觀念」。華爾澤本人則界定政治意識型態爲「一套政治信仰，其爲既存或構想中的社會解釋與辯護爲人所喜好的政治秩序，並且爲之提供行動策略。」顯然，意識型態必然涉及價值體系，惟華爾澤爲意識型態所下的定義，並未具有其個人的價值偏見而直陳意識型態的成分與要素，因此是一個比較適當而有助於我們之瞭解的定義。接着華爾澤旋即指出，意識型態的形成與特性是由其歷史上與當代的環境所促成，而列陳意識型態的九大特性，以澄清其含義。

其次，關於爲何有意識型態的問題，華爾澤認爲這涉及意識型態與政治行動間的關係。他將學者們所提出的意識型態理論，分爲唯心與唯物兩種意識型態理論、意識型態的立場論與功能論。

華爾澤指出唯心論與唯物論，各有所見，亦各有所蔽，且都犯了化約主義的毛病。立場論中，無論是現狀論或變遷論者，亦皆以偏概全，知其一面而不知其二。功能論中則有心理學派與社會政治學派之分，華爾澤似乎傾向後一學派的功能論。因此，他特別指出意識型態的政治功能有五：①提供認知架構；②提供規範準則；③處理與整合衝突的工具；④促成自我認同；與⑤形成個人與集體生活中的動力。

由於意識型態影響政治行為，而且提供政治評估的基礎，因此，現代意識型態的種種經驗性知識，即供給了吾人瞭解、思考與選擇意識型態所必需的基礎。如此，意識型態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唯華爾澤特別針對研究意識型態時所易犯的錯誤，提出一些警告。這些警告對研究意識型態者，頗有助益。然而，對於一般的讀者而言，最重要的是透過「導論」的指引，在瀏覽各章節後，經由思考自己的選擇，而確知自身之立場。

三

民族主義部份，僅由論「東方與西方的民族主義」一章構成，雷嘉在此章中對民族主義在東西方的演進與性質之演變，擇要地加以論述。其論東方的民族主義，實以非洲為例；而述西方的民族主義，則以法國與美國為主。

雷嘉首先澄清幾個與「民族」有關的概念。他視民族為一心理文化概念，而國家為一法政概

念，二者結合時則形成「族國」觀念，惟民族與國家的建立，不必然為同時或一致。至於民族主義，主要指的是共同歸屬感的心態。此外，由於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功能有所不同，雷嘉特別將之分為「肇端的」（建立民族）、「揚威的」（擴展民族），與「擴張的」（侵略其他民族）等三種民族主義類型。

其次，雷嘉指出民族主義源於法國大革命，而且是十九世紀獨特的政治現象。他認為十六與十七世紀歐洲一些強國的出現，實係主權國家與君主專制觀念的結合，而非民族主義的表現；再者，他也強調民族主義是浪漫主義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法國的民族主義而言，雷嘉認為法國大革命不但傳播了民族主義的觀念，而且供給了世人國族的原型；惟法國在革命後，民族主義變成與傳道精神、黷武思想及戰爭結合在一起，而其民族優越感終亦演變成「白人的負擔」。至於在十九世紀初才形成的美國民族主義，則提供了在歧異與異質的社會基礎上建立民族的典型；再者，美國的民族主義與美國人的傳道角色與「天命」(manifest destiny)觀念，實有密切的關係。

就廿世紀東方的民族主義而言，雷嘉認為此主要是亞非殖民地國家對西方的帝國主義與征服政策的反應。而東方民族主義的特質為：①反殖民主義；②暴力反抗；與③以知識份子中的精英為主導。然而，雷嘉特別指出，非洲的民族主義並非必然以同質文化與社會為基礎，而「民族」的概念在非洲實涉及不同的社會層次。因此，非洲國家在獨立後，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問題重

重，而對內產生了分離主義傾向，對非洲造成國際問題，對非洲以外之國家，則又標榜「中立主義」與「不結盟政策」。晚近，非洲國家對帝國主義強權之「新殖民主義」，一般又有二種不同的反應：①發展互惠關係；②提倡「再非洲化」，使非洲返璞歸真。

第二次大戰後，在西方世界可以見到一度陷於低潮的民族主義重新抬頭。目前歐洲的民族主義主要是表現於面臨外界的威脅，尤其是美國的挑戰時，歐洲各國會採取聯合陣線；而無外患的威脅存在時，歐洲國家則仍彼此相爭。就法國言，其戰後的民族主義是具體地表現於戴高樂主義中，而急欲躍升為超級大國。美國則重新興起傳播自由與民主的使命感，導致其常干預盟國的內政。而美國的民族主義在甘迺迪執政與參與越戰時，表現得最明顯。

顯然，民族主義在人類生活中已是事實，而且扮演了許多正面與反面角色。雷嘉在其結論中，特別提醒讀者的是：①民族主義能被利用來激發人潛在的破壞性與建設性力量；與②民族的意圖與其意圖的實際後果間常適得其反。同時，他也強調人類生活目前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國際瞭解與合作，而非更多的民族主義。更何況，由於戰爭性質的改變，將使得民族主義保衛民族不受外侮的首要功能失去作用。

四

極權主義的部份，是以綜述「極權主義的意識型態」的共同點為開始，其次才分論各種極權

主義的發展、演變與內容。

在「極權主義的意識型態」一章中，恩格爾主要是在指出極權主義的共同特點與起源。首先，他指出極權主義與傳統的獨裁有兩點顯著的差異。其一是，在權力的運用上，傳統的獨裁僅限於政治範圍內，而極權主義則廣泛地涉及政治、社會與經濟面，誠可謂「無所不包」；其二是，在羣衆的控制上，獨裁者常迫使羣衆對政治冷漠以利統治，而極權主義者則不僅灌輸羣衆特定的思想模式，而且還動員羣衆積極的支持。同時，恩格爾亦剖析極權主義的要索與特徵，以照明極權主義的概念。依恩格爾之見，極權主義的三個要素爲：①強調以二分法爲基礎的衝突與鬭爭，而將所有的罪惡諉諸「敵人」；②權威原則的領導；與③訴諸暴力。極權主義社會的五個特徵則爲：①精英統治（權力由領導者獨占）；②警察恐怖統治；③武器的獨占；④壟斷大眾傳播工具；與⑤經濟控制。至於極權主義的起源，恩格爾認爲不外是：①工業化和羣衆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下的產物（歷史環境說）；②社會達爾文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應用與助長（思想淵源）；與③社會階級的認同與權威人格作祟（社會經濟與心理因素）。惟無論如何，極權主義的確是二十世紀的產物，而且已是主要的政治事實。共產主義者即爲極權主義的左派，而法西斯主義者則爲極權主義的右派。如此，極權主義者間亦存在着對立的派別。顯然，恩格爾以極權主義間的對抗做爲綜論極權主義的結束，是在爲後三章的分論鋪路。

「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一章，主要是在敘述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奪權與篡升的經過，與其意識型態逐步將黨、政治和經濟混為一體的過程。墨索里尼曾謂：法西斯主義即墨索里尼主義。

他是在一九二〇年代義大利政局不穩和戰後義大利左派橫行，中上階層惟恐受到社會主義的支配和恐共病流行的歷史背景下興起。法西斯主義是主張國家至上、崇尚行動、反自由主義、反社會主義和反民主。法西斯與納粹的最大不同點是在「種族」觀念上。法西斯志在重建羅馬帝國，納粹則種族偏見深重，極推崇亞利安人，而恨不能消滅猶太人。其次，納粹亦比法西斯更具領土野心。希特勒所寫的「我的奮鬥」一書，則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經典著作。雖然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似乎已隨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之死而成歷史的陳跡，但恩格爾指出右派的極權主義似乎陰魂未散。阿根廷的貝隆主義、西班牙的佛朗哥，以及第三世界中的許多國家領袖言行，都有極權主義的跡象，而象徵着新納粹主義的興起。對此，恩格爾提醒讀者必須特別注意：①極權主義與情境因素（危機）的關係；與②極權主義與心理因素的關係，如領袖的魅力、個人崇拜與羣衆心理等。

在論「東方與西方的共產主義」一章中，雅各伯實係以蘇俄的共產主義為導線，來論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實際演變、修正與未來。首先，他直指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與理論基礎為唯物辯證史觀，並且將對馬克思主義之批評歸納為四點：①唯物辯證法；②勞動價值說；③經濟決定論；

與④對資本主義社會必亡的預言。他本人則認為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分析具有階級偏見，且不符合歷史事實。其次，他述及列寧以職業革命家的姿態實現馬克思主義革命，以及史達林主義的殘民以逞。惟雅各伯認為列寧革命違背了馬克思的革命論。再其次，蘇俄悲慘的共產與集體化模式，乃至蘇俄模式在其國內與國際方面的改變，雅各伯亦一一加以概略的論述，而指出蘇俄實為國際共黨的元凶，惟已受到主要來自中共的威脅。終而，雅各伯指出馬克思主義註定不能完全落實於人間，而必遭受修正乃至改變才能勉強存在共產國家中。

「游擊共產主義」(Guerrilla Communism)一詞，是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與游擊戰爭的結合。事實上，在廿世紀中已有許多共產主義者普遍採取游擊戰為革命鬭爭的主要方法。而廿世紀的游擊共產主義實有以下幾個相關連的特點：①馬列主義在「開發中」與「殖民地」國家的應用；②鄉村定向；③以農民為基礎；與④劃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而以遲滯的軍事衝突為基礎。在此論述「游擊共產主義」的一章中，雷嘉首先即剖陳中共游擊戰術的演變與其主要成分，接着分析越南與古巴二個共黨在革命時所採取之策略。而他的目的即在於描述、比較，與對照游擊共產主義在三個地區所以得逞的因素。此包括環境、意識型態，以及策略與戰術的運用。依雷嘉之見，中共首先正式採用了游擊共產主義，而中共的叛亂方式（游擊戰）在越南的經驗中被加以修正（必要時採正規戰），古巴則改變了方式（以軍事衝突取勝）。在三個地區中，共黨所以

作亂的情況大致相似，但經濟因素在古巴顯得較不重要。三個共黨叛亂的意識型態都是利用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結合的力量，惟古巴比較不固定。所有共黨意識型態都依賴策略與談判取勝。因此，共產主義者在革命時爲了爭取國內外的支持，都慣於唱低調。顯然，雷嘉充分瞭解到共黨「打打談談」戰術交互運用之爲害，才特別在此章中深入的剖析三個共黨叛亂的實例，以明真相，以警世人。

五

民主部分，由「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二章構成，也是全書最後的一部分。此似乎蘊含着，作者們將當代人類社會最後的希望置於政治與經濟的民主。

「民主」一詞源自古希臘，到了廿世紀雖已發展爲一神聖的符號，但其實質與意義却日愈被混淆，甚至被濫用，致使民主的前途堪虞。華爾澤在論政治民主的一章中，即努力澄清民主的意義與基本觀念，並且運用英美的民主傳統與經驗，來探討民主的理想與實際間的交集。首先，華爾澤一語道破民主的界說實涉及民主的規範性與經驗性假設，以及政治秩序運作的基本原則。他指出民主實不僅只基於個人主義，尚且基於對所有個體的尊重，而民主的平等實指有平等的機會去實現人的潛能，而非一切均等。其次，他列舉民主政治運作的基本原則爲：人民主權、個人自由、政治平等、同意與契約、國家爲受託管理者、公民參與與同意、歧異與衝突的環境、程序的

優越性（此包括公平的聽取意見與審議、節制與調和、以選舉定決策、決策的開放與暫時性、多數做決定但保障少數人的權利）、政治合法性的基礎與限制（人民僅服從合法與守法的政府），以及對人民與進步具有信心。

在論述民主在觀念與制度的發展上，華爾澤依民主性質與方式之演變，將之分為以民治政府的直接民主為主的古典時期，與以受人民控制的代議政府為主流的現代民主政治。古典時期又分為雅典民主、較早時期民主的發展、民主革命、十九世紀民主政治的建立，以及廿世紀的修正與民治民主，來加以闡述。惟古典的民主模式至今已被證明是烏托邦式的民主意識型態。現代民主政治，亦即代議民主的提倡者皆同意如果民主政治要能運行，人民在選擇代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必須重於與優先於他們對政策問題的決定。而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規範即為：公民經由選擇與改變政府，而設定政府政策的大方向。惟當代各國政府與政治制度的形式，不一而足，究竟何種政治秩序才是民主政治呢？對此，華爾澤引用了道恩斯（Anthony Downs 美國名政治學者，精研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所提出的八項民主指標，做為判別民主政府的標準。這八項指標中較重要的是：定期選舉；在選舉中失敗的黨派從未試圖以武力或任何非法的手段，使獲勝的黨派不能就職；與執政黨從未試圖限制任何公民或其他黨派的政治活動，除非他們有以武力推翻政府的企圖。

對於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華爾澤似乎有其精闢的見解。他隱約指出物理（地理環境等）、宗教、社會經濟條件，與共識等是否為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實有爭論與可議之處存在，惟開放的民主人格才是不可或缺的條件，而其他條件的重要性端視其對此種人格的培育有多少助力與相關性而定。終而，華爾澤指出，當代真正實施民主政治的政治系統仍居少數，而開發中國家，多半仍可能繼續運用民主的形式，而非真正實施民主。同時，民主政治在美國等其他先進的民主國家中，亦遭遇到現代社會結構日趨分化、科技發展所促成的專業化，乃至現代工業化社會的壓力與疏離感所造成的問題之挑戰。因此，民主的前途，實有賴民主人士的創發性、想像力與獻身。

在「經濟民主」的一章中，克里斯田森一開始即提出一個頗值思索的問題：政治民主是否需要經濟民主？以此問題為導線，他論述了二種對立的答案，亦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且述及了意識型態比較不明顯但立於上述二者之間的「混合經濟」觀念。首先，他指出資本主義成長於工業革命中，民主社會主義則是對資本主義的反抗。正統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特質是：私產至上、利潤取向，以及自由市場與競爭制度的存在。同時，資本主義也假定財產私有權最能擴大人的利益，而利潤動機最能促進生產與進步。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即為資本主義的經典著作。至於資本主義的政治信條則為：①政府的主要角色是維持自由市場制度的運作；②經濟權力分散；

③財富不平等是正常而且可欲的；與④市場制度是組織經濟秩序最民主的方法。惟資本主義的流弊所及，致使貧富懸殊、勞逸不均，乃至民不聊生，斲喪人性與倫理道德，拜金主義流行，定期的經濟危機循環，與導致帝國主義戰爭等百害弊端叢生，因此，亦招致了許多嚴厲的攻擊與批評，而社會主義乃應運而生。

對於社會主義的發展，克里斯田森簡述了早期英法的社會主義運動，三大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利葉，與歐文）與布蘭（Louis Blanc）及馬克思的觀念，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約翰彌爾的社會主義傾向，與亨利喬治的「土地單一稅」主張，惟他特別推崇費邊社會主義者的不嗜空想與其實際貢獻與努力。更重要的是，克里斯田森辨清了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性質上的不同，而且指出二者實亦為針鋒相對的理論。此不同之所在，即在於民主社會主義是：①倡民主，反暴力；②視國家為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工具；③不必完全消除私產，私產亦未必為萬惡之源；④不求經濟生活的全面國有化；⑤不強調階級鬭爭；⑥強調人的意志與努力，非必以經濟決定論為基礎；與⑦沒有教條權威。惟克里斯田森認為，由於凱恩斯貨幣與財政理論（國家投資與充分就業）的提出與獲得證明，已使社會主義者的國有化主張變得不重要，乃至與社會主義不相干。至於強調計劃的觀念，他認為雖然在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發展史上較晚出現，但仍為主要的社會主義要旨，可稱為「社會主義的指針」。再者，由於國有化運動的消失，民主社會主義與